

记者生活三十年

——亲历民国重大事件

陶菊隐 著

中华书局



青年时期的陶菊隐



老年陶菊隐

出版说明

陶菊隐(一八九八—一九八九),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自一九一二年进入新闻界,陶菊隐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写作了大量通讯、报道、特写、述评和专栏文章。一九四二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陶菊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菊隐丛谈》(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吴佩孚将军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陶菊隐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陶菊隐从一个无名小辈成长为著名记者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曾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目击各派军阀斗争的种种内幕,亲历了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并被蒋介石视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记者生活三十年》是陶菊隐根据三十年新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在晚年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于一九八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纪实的风格、生动的笔法,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间的政治百态和作者在新闻界的经历,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蒙陶菊隐先生后人慨允,我们对此书重新校订,简化了各章节的小标题,增加了三十余幅历史图片,并增加副书名“亲历民国重大事件”,重新出版。陶菊隐先生一生著述之绝大部分都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再版,是对陶菊隐先生的纪念,更是他与中华书局常年合作而结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7月20日

目 录

引 子	(1)
-----	-----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

辛亥参军一瞥	(1)
年幼失学	(3)
始入新闻界	(5)
接办《湖南新报》	(10)
改办《湖南日报》	(15)
始为上海《新闻报》写“长沙特约通讯”	(21)

湖南宣布“自治”的六年

新闻记者得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	(24)
湖南政变,谭延闿下台	(28)
采访中的初步体会	(33)
湖南第三次政变内幕	(38)
湖南省宪法草案完成	(40)
关于湘粤联盟	(42)
湘军“援鄂”战争中的采访	(45)
关于湘直议和以及对张、汤两文的订正意见	(52)
孙中山改道北伐	(60)
到上海初访《新闻报》	(62)
吴佩孚电战联治派,黎元洪拉拢南方人	(69)
湖南选举的内幕	(73)
湖南护宪之战又起	(76)
直系政权一败涂地,联治运动成尾声	(82)

湘军内部又起分化 (87)

萍踪无定的五年

由长沙赴汉口 (93)

刘玉春血战汀泗桥,吴佩孚兵败走河南 (96)

到上海再访《新闻报》 (100)

参加《武汉民报》的一瞥 (105)

济南五三惨案躬历谈 (109)

国民党控制言论步步加强 (120)

福开森出卖《新闻报》股权(补述) (124)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四年 (126)

回长沙侍母终年 (149)

在汉口的两年

任《新闻报》的驻汉记者 (152)

《大公报》邀请我兼任该报“客串”通讯 (153)

“一二八”后洛阳之行 (160)

《新财神献宝记》 (164)

在南京的三年

创办《华报》,为《新闻报》改写专栏稿 (169)

为《国际汇编》写论文 (173)

三访《新闻报》 (175)

由南京迁居上海

我进《新闻报》后的工作任务和待遇 (177)

《新闻报》轶事 (179)

《居院长失踪之谜》 (182)

《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里》 (184)

《台儿庄上好月色》 (189)

汉口之行·····	(194)
蒋百里病逝宜山城·····	(203)
金神父路十八号·····	(210)
《海上春秋》·····	(213)
舒新城给我的鼓励和帮助·····	(222)
白色恐怖下迁居·····	(230)
别了,《新闻报》·····	(231)
作者后记·····	(235)

引 子

我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此后虽然断断续续地为北京、上海、香港各地日报或期刊写过一些稿件，但都是临时“客串”，不列入“记者生活”之内。现将这一期间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名为《记者生活三十年》。由于事隔多年，记忆十分模糊，昔年亲友，凋零殆尽。虽有个别健存，对我也不能多所帮助，因此本文所记，不免与事实有出入之处，希知者予以指正。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

辛亥参军一瞥

我生于一八九八年，即戊戌变法的一年。童年随父母到南京，在文昌宫小学上学^①。文昌宫在城东三条巷的南头，我的家就住在这条巷子的北头。我父亲在两江将备学堂任职^②，月薪才八两银子^③。每天一大早，我提着菜篮子跟随父亲在大行宫买菜，父亲健步如飞，我却赶不上，经常累得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菜买好了，父亲急匆匆赶到学堂去上班，我回家放下菜篮子后还得赶到文昌宫去上课，父子俩的时间都排得非常紧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苦生活还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

文昌宫小学不供膳宿。每天上学前，母亲给我铜板一枚^④，叫我中午下课后到复成桥堍大饼摊头买饭吃。我想到母亲过着那种衣食不周的苦况，就把铜元节省下来，月终一齐还给母亲。可是母亲反而生我的气，怪我不该饿坏了自己的身子。她一面责备我，一面背转身擦眼泪，我哇地一声哭了。

每天晚上，父亲还得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向我讲解《孟子》、《左传》、《战国策》，有时要我背一节书，有时又叫我写一篇短文。他看了我的作文，总是摇摇头不以为然。一次我顶嘴说：“我的文章还贴在学堂里的

① 一九三八年南京沦陷时期，文昌宫毁于兵燹，旧址荡然无存。

② 两江将备学堂地址在小营，校长(当时称总办)为族人陶森甲观察。我父教国文课兼校医(中医)。

③ 清朝末年，我国以银两为货币的主要形式，铸银有银锭(一两)、银元宝(五十两)。光绪年间，欧洲银洋流入中国，我见过铸有雄鹰展翅图的鹰洋，“洋钱”之称自此而始。同时，清政府亦铸龙洋，银两、银元同时通用。民国成立后，先后铸有孙中山半身像(俗称孙小头)、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始变两改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制，禁止银元流通，但因法币不断贬值，民间仍有以硬币为交易筹码者。

④ 当时生活费用很低。铜元一枚换十个穿眼钱，可供摊头买饭吃。银角、铜元、穿眼钱，都是当时的辅币。

黑板上呢!”^①

父亲哼了一声：“这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出来充大王。”

我们小学里的姜老师是个民主革命派和爱国主义者，所出作文题如《游明孝陵记》、《哀韩论》，都是有针对性的^②，这在同学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一九一〇年我才十二岁，写过一篇长仅五百字的小小说，题名《去年今日》，在姜老师的鼓励下，送往上海《时报》编辑部。这是我胆大妄为为报纸写稿的第一篇。稿子登出后，我高兴得就像中了秀才一样。后来续写《苦海》、《发》等篇，也都发表了。这些作品都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有点荒唐，由于当年写小说和小品文的人很少，这几篇小说又系少年童稚之作，所以号称上海四大报之一的《时报》^③，也从宽录取了。

一九一〇年，我的家由南京迁回长沙时，我对第二故乡南京和朝夕相见的小学师友们，都不胜依依惜别之情。

就在这一年，湖南大水为灾，哀鸿遍野，某些官绅有的还运米出口牟利，有的则囤积居奇，因此激起了很大的民忿。有一晚，突然火光烛天，喊声四起，外间闹闹嚷嚷：“有人放火烧了抚台衙门，抚衙前的帅字大桅杆也被一个姓陈的木匠锯断了！”这就是当年耸动全国的长沙灾民火烧抚台衙门的一次大暴动^④。

同一年，我由亲友介绍去考长沙有名的私立明德小学。此时考期已过，堂长刘师陶先生见我来自远方，破例允许补考，并亲自出题面试。我刚刚交了作文卷，刘老师就带笑点头说：“甭再考了，你可以插入三年级，即日交费上课。”我刚回到湖南，又遇到一位良师，我该多么高兴啊！

一年后，小学毕业了，一九一一年我又经过插班考试插入了明德中学

① 小学每周作文一次，姜老师选择前三名卷子，叫本人抄下来，贴在黑板上示范。

② 一九一〇年，朝鲜（韩国）为日本所灭。我仿《哀六国论》写了《哀韩论》，文中有云：“灭韩者非日本也，韩也。韩则既亡矣，韩人不暇自哀而我国人哀之，窃恐我国人不暇自哀而他人哀之也。”

③ 上海四大报为《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

④ 这是一次“官逼民反”。有一住在南门外的寡妇，籼米缺少几个穿眼钱，受到店员侮辱，她气忿不过，回家上吊死了。事件发生后，当地群众忿忿不平捣毁了这家米店，由此扩大为全城抢米大风潮。湖南抚台岑春煊派兵弹压，群众纷纷涌向抚衙请愿平粟，岑抚又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因而发生这次大暴动。事后岑抚被革职，某些官绅也受到“严旨申斥”。

二年级，同学们戏呼我为“连升两级的跳班生”。

长沙明德、经正两中学都是湖南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子靖)先生创办的。明德附设小学。胡自任总校长，中小学各设堂长一人主持教务。我入中学时，经正已并入明德。不久明德又在汉口创办大学一所。

经正中学是黄克强先生(当时称黄廛午老师)邀集革命同志吴禄贞、宋教仁、张继、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的革命摇篮，后因组织起义失败，黄先生偕其战友亡命日本。他虽一去不返，全校师生还是忆念不忘，因此民主革命思想蔚然成风。我得列入门墙，这对我的思想又起了深刻的影响。

我入明德中学不久，我父亲为了养家活口，又到广西桂林任教去了，临行将我托付叔父照管。我叔父是湖南新军的一位中级军官。

一九一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二十二日长沙新军继起打接应。湖南是响应起义最早的一个省。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长沙大中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大家纷纷请愿投笔从戎。湖南都督同意成立学生军一营，招收大中学生入伍。一九一二年年年初，我未征求叔父的同意，决定志愿参军，当前的问题是，我年方十四岁，不够入伍条件。事有凑巧，我们明德中学的李雨初老师(体操教习)当上了学生军的管带(营长)，他把我们几个小伙子随身一带，带进了又一村学生军营部，于是我们未办入伍手续就被收录了。

李雨初老师任职不满一个月，忽被都督府免职，以蒋宝三继任。原来，清朝末年，所有文武衙门，一进门就有一所大厅堂，为停放车马和官轿之用。厅堂正中板壁上绘有红日一轮，每逢新官上任，都用红纸写上“指日高升”四个大字，贴在红日上面，作为本官步步高升的好兆头。李老师未能免俗，仍旧照此办理。有人控诉他思想落后，不配做革命军官，因此受到革职处分。继任管带的蒋宝三是楚怡学校的体操教习。楚怡也是长沙有名的学校。明德、楚怡两校学生在学生军入伍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次管带换人，明德入伍生垂头丧气，楚怡入伍生趾高气扬，这种蜗角蛮触之争，未免浅薄可笑。但新官也不能久于其任，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学生军奉令解散，入伍生一律退回原校继续求学。

年幼失学

我重入明德后，因一件“小误会”，竟被开除出校，随后这种误会又扩

大到湖南雅礼大学(预科),从此入学无门。

明德中学新聘的国文老师汪根甲,前清解元出身,因此蜚声于时。他每次上国文课,总得抽出一定时间讲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大受同学们欢迎。他出作文题也往往不按常规,学生可以自由选题,这种自由主义作风,也正合乎我的个性。

一次,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题为《饭桶先生传》,文中虚构一个人物,宽其袍而博其袖,鼻架玳瑁眼镜,食有兼人之量,而腹中空空如也。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篇文章会招来文字之祸,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第二天,中学堂长何衢找我去谈话,责我不应以文字侮辱老师。他说:“你写了一篇文章,影射了汪老师,他气得向我辞职,你看怎么办?”我极口申辩此文并未影射任何人。何先生叫我自己去向汪老师解释,“如果得到汪老师的谅解,那是再好没有,不然的话……”他摇摇头不往下说了。

我立即到汪家去解释。汪老师不待我讲完,即再三表示他对我不但毫无误会,而且非常器重,叫我对他也不要有所误会。于是我又去见何先生,如实回报。何说:“汪老师对我不是这样讲的。他提出了两种办法:要么让他辞职,要么把侮辱他的学生开除出校。”何先生劝我自动退学以全体面,如其不然……他又不往下说了。

我因问心无愧,不肯自动退学,毕竟受了挂牌开缺的处分。

这一年,我叔父调往湘西辰州府升任巡防营统领,我无家可归,只得暂住在北正街陶氏宗祠里。这里免收宿费,膳费也比一般客栈为廉。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堆放杂物的前楼,每逢夜晚,月落乌啼,孤灯如豆,不免有少年坎坷之感。

有一位初相识的朋友汪先生(忘其名),介绍我到《女权日报》当编辑,这正投我之所好。我在那家报馆呆了约摸两三个月,这且按下不表。

我先后接到父亲和叔父的来信,都认为进报馆究非正业,叫我仍以求学为宜。于是我在《女权日报》结束后,又投考长沙雅礼学校,考取了预科(丙班)三年级。

我满以为进了雅礼学校可以平安无事了,谁知冤家路窄,又有祸事临头。

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又名耶鲁会)所办的教会学校,读圣经,唱圣

诗,做礼拜,一切教堂里的繁文缛节,这里应有尽有。课程以英文为主,兼授国文及本国历史。该校分为五班,国文课分由两位老师担任:一位教甲乙丙三班,一位教丁戊两班。我没有想到丙班国文教师正是那位睚眦必报的清朝解元汪根甲先生。他一眼看见了我,就像撞到了凶神恶煞,竟至避道而行。当天下课后,舍监王先生找我去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知在哪里得罪了汪老师,他不愿见你的面,不肯教你的课。我们劝说无效,因此提出一项折衷办法,以后你可以改在戊班上国文课,其他课程仍可在丙班上课。”我听了这段话,真像哑巴吃黄连,有说不出的苦,便把在明德中学所受的冤枉气如此这般倾吐了一番。王先生淡然一笑说:“孩子,过去的事不必提了,你就委屈点,听我们的话吧!”

如此挨过了一个学期。暑假到了,美籍教务长解白耐先生召见了。他当面宣布:“我们学校无法收容你,下学期你不要再来缴费了。”我知道汪根甲又在洋人面前捣了鬼,于是又把旧事重提一遍,并且央告说:“贵国是世界上最讲公道的国家,美国人又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请勿听信一面之词,使我蒙不白之冤。”解白耐若有歉意地回答说:“我很同情你。可是我们学校可以没有你这样的学生,却不可以没有汪先生那样的老师。”于是我无言而退。

始入新闻界

这里补写我进《女权日报》的一段经过。

汪××先生介绍我进《女权日报》时,该报总经理丁佩兰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这是我跨入新闻界的第一步。

《女权日报》的创办人唐群英、丁佩兰都是当年长沙最出风头的“女伟人”。原来,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大风暴,全国某些地区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有湖南的唐群英、丁佩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志锐,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武昌的炮声一响,这些“女伟人”有的组织“女子北伐队”,有的组织“女子救护队”,准备开往战地服务。不久南北议了和,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①,于是又有“女

^①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篡夺了临时总统,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

子参政会”出现。她们大声疾呼地鼓吹男女平权，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力争女子名额，学校要规定男女同校，反对家破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无人敢加以非难，甚至大总统、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参议，以示尊重女权。长沙《女权日报》就是这种新风气的产物。

我的新朋友汪先生原系《女权日报》记者，因另有高就，荐我自代。该报设在长沙南墙湾^①天后宫内。我见设在大殿内的编辑部尘埃满目，几位穷书生围坐在一张方台子的两边，没精打采地工作着，心中不免踌躇，但又不便掉头便走，只得耐心地坐下来加入了他们这一伙。

该报由于提倡女权，内容又无特色，不合男士们的胃口，而那时女子阅报的风气又未打开，因此营业不振。该报对编辑员只供膳宿，不给薪水，甚至开饭时间已过，想吃一碗蛋炒饭，也须付费二角。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谁愿跑来吃此嗟来之食！所以我任事不久，便有浩然求去之心。幸而该报因付不出印刷费而停刊，不用我踏破靴底去另找替身了。

该报另一创办人唐群英，我虽未见其人，却也久闻其名。不久她闹了一件“婚变案”，她的名气在省内外就更加传开。现将此案内容简述于下。

一九一三年二月，《长沙日报》载有郑师道、唐群英二人的结婚启事。唐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立即带领一批娘子军冲进府后街《长沙日报》社，一把揪住了主编傅君剑先生^②，迫令更正并登报道歉。傅答以广告不属于编辑部，这条广告从何而来，他也无从追究，即使查出登户，广告也从无更正之例。唐不禁心头火起，便又指挥娘子军冲进了该报排字房，七手八脚地把全部字盘推翻，因此次日该报无法出版。

事件发生后，唐傅二人同时投诉于都督谭延闿之前，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一个要赔偿报馆损失。谭调停无效，只得动用公款二千元赔偿报馆损失，此案遂以不了了之。

后来查明，郑师道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这条广告是他自己上门来刊登的。他追求唐群英未遂，就要此无赖，原想弄假成真，不料弄巧反拙。他在长沙立足不住，是年七月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到浙江另谋活

① 此时长沙尚未拆城。

② 傅熊湘，字君剑，又字钝根，湖南醴陵人，著名南社诗人。《长沙日报》是同盟会所办的刊物。

动，因出言不逊，为浙督朱瑞所杀。

我在雅礼退学后，仍旧回到陶祠“根据地”，过着那种单调孤独的生活。一九一三年上半年，又有一位热心朋友刘先生（忘其名），介绍我去当某一小学的算学老师。我素不喜算学，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每逢上这门课，任凭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沫喷飞，我却充耳不闻。如今叫我当起算学老师来，岂非开我玩笑！我只得敬谢不敏。可是刘先生一再劝我边学边教，勉为其难，我在失业与失学的夹攻中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

一位新教员上第一课，校长照例要到课堂来听课，因此我的底细马上就被揭穿了。隔了几天，他在办公室跟我闲聊，说什么在报上拜读过我的文章，“少年英俊，久仰得很”。我说：“小品文章，游戏之作，何足挂齿。”他说：“蛟龙终非池中物，足下前程远大，可为预卜。”我说：“岂敢，岂敢。”

又过了两三天，校长打发庶务先生前来传话说，“我们这里‘庙小菩萨大’，不便耽误先生的前程”，随手给了我一个月的薪水三十串文，我这才知道是被校长辞退了。

我再回到我的“根据地”，继续为上海《时报》写小品文。

一九一三年下半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下了台，袁世凯派汤芑铭继任湖南都督。汤到任后，热烈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残酷杀害国民党人，所有国民党系报纸全被封闭。长沙剩下来的地方报就只有汤自己办的《大公报》、进步党系的《湖南公报》以及由《湖南公报》分化出来的《大公报》了^①。

由于地方报受了摧残，上海报乘机倾销，尤以《时报》在长沙一地实销五百份为最多。当时，订阅上海报有“走报”和“定阅户”两种：“走报”阅后须将报纸于当日下午或次晨退还，报贩自己来取，收费可以减半；“定阅户”则要迟一天才能看到报纸。因此，上海报每份可以分送给三家阅户，五百份等于实销一千五百份，超过了地方报任何一家的销数。

《时报》增辟“余兴”栏，扩大副刊版面，广泛征求小说和小品文；我是“余兴”栏的基本投稿人之一。我还记得，有人写过一篇《余兴点将录》，将基本投稿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我被比作“小李广花荣”。

^① 长沙《大公报》与天津《大公报》不是一家。

《时报》对“余兴”栏稿件均以有正书局代价券为酬^①，每千字酬以一至二元。代价券只能购买该局本版书刊，不能兑换现金，而有正书局所出书刊不外三希堂碑帖、珂罗版画册及新小说等，并非人人所需。此项稿酬，堪称菲薄之至，但《时报》取稿从宽，新进作者趋之若鹜，所以该报并无稿荒之虞。

《时报》主编包天笑先生鼓励“余兴”投稿人兼写地方通讯，美其名曰“特别通讯家”，我也应征写过几篇。这是我为上海报写长沙通讯的嚆矢。当时，我既未找到采访门径，平日又鲜交游，往往揣摩街谈巷议连缀成篇，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杂文散记，新闻价值很少。此项“特别通讯”也以书券为酬，应征者寥寥无几，不久就在报上绝迹了。

我住在陶家祠堂时，往来的穷朋友有黄若汪、田汉、徐庸庵、杨士顽、黄咸夷等。田汉当时在长沙师范读书，是校长徐特立的高材生。该校就设在陶祠附近长沙县城隍庙内。田汉有次课余来访，见我正在埋头写小品文，便不来打搅我，他也伏案填词一阙，填毕，扬长而去，彼此并未交谈。数十年后，他已名闻全国，他既未来访我，我也不去看他，竟同陌路人一样。黄咸夷是国学大师王湘绮的门人，穷得身外无长物，寄居府围后曾侯爷的家里^②，我跟曾家也有往来，因此与他相识。我打算创办一种日报，定名“三楚新闻”，黄愿为我奔走，曾家也愿捐助开办费若干，同时我们又征得伍家井涵德女校校长的同意，答应拨给房屋数间为我们开办报馆之用，后因省会警察厅不准立案，此议因而作罢^③。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到了一九一六年。是年夏天，袁世凯因做皇帝不成气死了，汤芑铭也给湖南军民赶走了，谭延闿卷土重来“二次督湘”，于是国民党系报纸又在长沙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设在戩子桥的《湖南民报》^④，主办人为衡山人宾月卿。明德老同学许延翰^⑤介绍我进该报时，编辑员额已满，我便毛遂自荐当了一名“不管部大臣”。我的任务是，

① 《时报》与有正书局财东都是上海名人狄平子。

② 曾侯爷指曾国藩的后人。

③ 当时的警察厅长为张树勋（竹桥）。汤芑铭督湘时，办报须向警厅立案，否则不准发行。

④ 这是早期的《湖南民报》，其后又有同名报出现。

⑤ 许延翰后改名彦飞，时任《湖南民报》副刊编辑。

每天收集北京及各地报纸的精华，融合写成一篇《国内大事述评》，登在“紧要新闻”（国内新闻）的头条。这种独出心裁的格局，后来北京《公言报》^①编者林白水也照此办理，当系不谋而合。

《湖南民报》经费也很困难，对于编辑人员，每月每人发给报馆股票二十元（股票尚未印好，这是一张临时股款收据），另给现大洋三元为零用费。每逢“发薪”之期，宾先生总是陪笑向每一位编辑员作揖打拱地说道：“这是一点微意，请笑纳。”因此我们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微意先生”。

尽管如此精打细算，报馆还是入不敷出，后来宾先生不得不宣告“下野”，让给宝庆人刘棠猷接办。

刘下车伊始，就厉行裁员减政，首先拿我这个“不管部大臣”开刀。这一下马威立刻引起全体编辑员的反感，大家宣布总辞职以示抗议。其实，刘先生裁员是半真半假：一面裁去旧人，一面引进新人。由于引起反感，刘先生不得不备函向每一位编辑员郑重道歉，并撤销裁员的决定。我却无心恋栈，掉首不顾而去。

我去不久，《湖南民报》也因付不出印费而倒闭了。

我在《湖南民报》认识了舒新城先生。他是来自溆浦县的穷学生，在湖南高等师范肄业^②。他半工半读，暑假到城内担任新闻记者或在中学任教，假满仍回原校读书。我们在《湖南民报》仅仅打了个照面，就各自西东，不料二十年后，又在上海相见，并且成了风雨同舟的好友，却非始料所及。

我在《湖南民报》还结识了两位不平凡的投稿人：一位谢×（忘其名），寄来长篇幻想小说，古香古色，想入非非，文笔亦颇苍劲。我们曾约期相见，来者竟是一位身着军服的现役兵士。一位是著名话剧演员陈大悲，以演《茶花女》得名。

① 《公言报》为安福系的机关报。

② “高师”设于湘江对岸岳麓山下，故又称“岳麓师范”。其前身为岳麓书院，后身为湖南大学。该校对优秀学生免收学费。